

# 谈谈近年来我国的索引工作

潘树广

(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)

索引的编纂和理论研究,在我国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问。

说它古老,是因为唐宋时期许多“采摭群书、注明出处”的类书已具有索引的部分功能;明末傅山编纂《两汉书姓名韵》,是我国早期的人名索引;蔡烈先在一六四九—一六五二年编纂的《本草万方针线》,实是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的“书后索引”;清乾隆年间章学诚、汪辉祖对索引的理论研究和编纂实践贡献尤大。

然而,借鉴欧美各国近代先进的索引法,结合我国书籍文献的特点,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我们自己的索引与索引法,却是近几十年的事。所以说,它在我国又是一门年轻的学问。

索引是茫茫书海的航标,是读书治学的工具,更是科技情报工作者须臾不能离的利器。

下面就近年见到的有关索引编纂的几个问题,谈谈个人意见。

一、科学性。目前有些索引编排欠科学,有待改进。如中华书局1977年整理出版清代王琦注本《李太白全集》,书后附有篇目索引(以篇名首字笔画为序),这是大好事。但你如果想通过篇目索引查找“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”一诗(此诗颇有名,《唐诗三百首》里有的),在三画“下”栏找来找去也找不到这题目,这是什么缘故呢?原来,《李太白全集》书前目录所列篇题与正文所标篇题不完全一样,索引编制者不是两者兼顾,只是根据书前目录进行登录。书前目录所列篇题有时是经过省略的。索引编者根据省略的标题进行登录,而读者心目中的篇题却往往是全称,难怪常发

生查找不到的现象了。解决的办法,是用互见法处理同篇异题。

有些索引,明明自己规定好了凡例,却又不严格按照凡例去做,这也是不科学的表现。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《文选》所附索引就有这种情况。例如,编者在篇目索引的“说明”中说:“本书底本卷首所列总目,文字与正文篇目间有出入,索引以正文为据。”但篇目索引第四页左栏倒数第十五行“奏记诣蒋公”一题,系依卷首总目;若依正文篇目,则应作“诣蒋公”(“奏记”是类目名称)。又如,篇目索引的“说明”说:“总题下如有小题,据小题。”事实上,索引有好几处仅列总题,并未分列小题。如卷三十三“《九歌》二首”总题下有《少司命》、《山鬼》两个小题,按凡例应据小题登录,但篇目索引仅标示“九歌”二字,小题未予反映。又如卷三十陆机“《拟古诗》十二首”总题之下,有《拟行行重行行》、《拟今日良宴会》、《拟迢迢牵牛星》等十二个小题,按凡例应一一分列小题并注明页码,而篇目索引反笼统地列出总题《拟古诗》,既未注明首数,更未分列小题。

专科性书目索引取材是否全面,是否遵循统一的原则,这也是衡量科学性的标志之一。文物出版社1978年12月出版的《中国考文献目录》在这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缺陷。该《目录》凡例规定:酌收若干相关学科文献,如中国科学技术史等,因而,收录了《我国古代农学发展概况和若干农学资料概述》等,这是对的;却又不收《中国农学史》(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)、《中国农学书录》(农业出版社1964年版)这些重要专著。又如,同属商务印书馆在50年代重印的

科技古籍，既收录了《营造法式》，却又不录《考工记图》、《天工开物》等，不知是什么道理。

二、便捷性。索引应力求简便、直接，使读者敏捷地索得所需之项目。这是大家都关心，但长期以来未能妥善解决的一个问题。

首先碰到的，是采用什么检字法的问题。1928年，万国鼎曾写过《各家检字新法述评》，发表在《图书馆学季刊》二卷四期上。1961年，《文字改革》杂志八、九期有“汉字查字法问题特辑”，看了这两个材料，大体可以了解各家对检字法的意见是多么地分歧。

我以为，用汉语拼音字母编制索引具有便捷等优点，也最有发展前途。关于音序排列法，五十年前黎锦熙等前辈用“国音索引法”排列120几万张卡片就是一个成功的先例。五十年前用的“国音字母”尚且如此方便，今天有更为完备的《汉语拼音方案》，那就更理想了。

1958年《汉语拼音方案》公布后，有些部门试行过汉语拼音略写式快速索引法（或称“ABC快速索引”）。办法是：取条目前四个（或五个）字的拼音的第一个字母作为索引代号，然后把索引代号按字母表顺序排列。用这个方法编制书名、人名、篇名索引尤其适合，曾大受欢迎。因为它不仅具有排列稳定、检索便捷等优点，而且便于处理夹有外文字母的条目，如：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CT机械原理          | CTJX  |
| d小调四重奏（舒伯特）     | DXDS  |
| 尖峰型P波           | JFXPB |
| 送O、E、君携兰归国（鲁迅诗） | SOEJ  |

如果用笔画顺序编制索引，遇到这种情况就很难处理（有人遇到外字母一律作O处理，这其实是很不合理的）。

有同志担心社会上还有许多人没有掌握汉语拼音方案，采用汉语拼音编制索引会受到一些人的反对。对此，可以从两个方面解

决：①同时编一个辅助检字表作为过渡性措施；②鼓励这些同志赶快掌握汉语拼音方案（这对推广普通话也大有好处）。现在小学一年级都在教汉语拼音，（不少地方幼儿园就教）。他们将来掌握汉语拼音索引不会有什么困难。我们研究问题的起点似应高点，眼光应放远点。汉语拼音方案的广泛应用，是大势所趋。如今，连外国人编制中国古籍索引，也往往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了。如日本青山宏编的《花间集索引》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4年版）就是一个例子。

为了便捷，必须对某些用分类法编排的索引进行改革。

论文索引主要有两种编排法：一是分类法，一是主题法（主题词标引法）。分类法虽然有它特有的观点，但弱点也很突出。这在一些社会科学的论文索引中表现得十分显著。《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》就存在这问题。例如，同属有关南京西善桥南朝墓砖刻的论文，《对于南京西善桥南朝墓砖刻竹林七贤图的管见》一文编入“考古学分论·魏晋南北朝”部分，《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及其砖刻壁画》一文编入“田野考古、江苏”部分，而在“美术考古”部分，对上述文章都未予反映。这样，就往往使读者陷入漏检的困境。如果用互见的方法，或者像1957年《中国史学论文索引》那样，附一个详细的“辅助索引”，读者就方便得多。“辅助索引”是把人名、地名、朝代名、原有标题以及各种专名按笔画排列，实际上是吸取了“主题法”的优点。这种做法，很值得提倡。

三、系统与及时性。这里所说的系统性，从横的方面来说，是指各门学科，都应该有专题索引，力求全面。从纵的方面而言，是指各学科的论文索引收录资料的时限，应当连绵不断，而且力求有累积索引。目前在“纵”、“横”两个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。有不少学科还没有自己的专题索引，而某些学科、某些专题，又重复过多，造成浪费。

# 图书馆学教育机构行政管理探索

张君炎 张金芳 陆惠鸿

(上海复旦大学分校图书馆学系)

自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及其前身文华大学图书馆学系创建始,我国图书馆学教育至今已有六十年的历史。但是旧社会科学文化落后,解放后图书馆事业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,十年浩劫,更受到骇人的摧残,图书馆事业和教育与其它科学相比尤显得落后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,为着实现四化的需要,图书馆事业需要一个较大的发展。几年之间,全国新设的图书馆学专业系(科)从建国初期只有四所:——北京大学、武汉大学、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专修科、社会教育学院图博科,院系调整后仅有北大、武大设有图书馆学系,目前一下子猛增至二十余所。怎样适应这种新形势,怎样办好图书馆学教育,图书馆界的同志们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,总结出了不少宝贵的经验。就我们所见大都是涉及教育内容和教育计划方面的,对解决当前图书馆

学教育行政管理方面的一些主要问题和办好一个图书馆学系(科)应有怎样一个合适的高效能的行政管理机构,探讨比较少。这个问题很重要,不认真研究不利于迅速发展我国图书馆事业和教育。我国理论界在研究现代的管理体制,各条战线也在围绕着管理体制的问题展开讨论。图书馆学教育也面临着这么一个问题。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仅在教学内容上等方面努力,而不同时在行政管理问题上进行探讨或研究、采用现代的科学的的管理方法,是改变不了落后的面貌的。

我们在几年的教学实践中对这问题有些认识,但在理论上全面探讨还是很肤浅的。写出来一是求教于同志们,二是以引起更多的同志来共同研究探讨。

图书馆学教育行政管理,所涉及的内容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:一、行政组织,二、物质设施,三、课程设置,

一定要改变那种无计划的、零打碎敲的状态,编出一批为当前学术界所急需的、有份量的索引来。

这里所说的及时性,不是几年前那种“运动索引”的“及时”。那种“及时”,转眼“过时”,有资料价值的不多。我以为“及时性”是应当与“系统性”有机结合的。例如南京图书馆在五十年代编的《图书馆学论文索引》第二辑(商务印书馆出版),收录论文的时限是1949·10—1957·12。上接李锺履编的第一辑(清末—1949·9·)。这样,我国从清末至1957年12月的图书馆学论文便得到了系统的著录。但从1958年到现在,

有二十几年的空白,失去了系统性。如果南京图书馆“重操旧业”,补上这段空白,那就又变成有系统的了。以后,若能通过期刊其他方式按季报导全国图书馆学论文(题录),那就是及时性的体现。如果一年或若干年后,再编个累积索引,那又是系统性的体现了。推而广之,如果全国各图书馆学会分工协作、统筹安排,各自根据自己的条件和专长,选定一个或若干个专题,有系统地、及时地编制索引,那对于整个学术界的贡献将是不可估量的。

(本文据作者1980年夏在江苏省图书馆学会科学讨论会上的发言稿节录)